

《阿黛尔的生活》中的身份认同困境 ——以符号学为视角

李佳楠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本文以电影文本主角阿黛尔的身份认同困境为核心论题,从电影中的语言、身体、空间、活动场域等几个维度出发,运用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等性别符号分析理论、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对权力控制体系如何制约阿黛尔的行为进行了具体分析。本文对阿黛尔的自我性别身份在对权力体系的归顺与反抗中表现出的“流动性”进行解析,从而使电影文本在符号学理论背景下呈现出关于个体“身份认同困境”的新意义。

关键词:阿黛尔的生活;同性恋;符号学;法国电影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82(2014)06-0026-05

自我身份的认同是法国电影《阿黛尔的生活》一直要表达的主题,影片开场借用了马里沃的小说《玛丽安娜的生活》里的话语来引出这一点:“思想占据了我,我是一个女人,我讲述我的故事。”阿黛尔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不是由出生便已完成的,而是在自我发现、自我认识中不断生成的。她在对身份的选择中,总会“受控于自我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张力”^[1]。自我有时会主动摄取他者、迎合他者来进行身份建构;也会抵抗权力话语对个体的规训,追求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与区分。在这一充满弹性的过程中,我们得以明晰地看到权力系统对于个体的操纵力量,并从中寻找到突破的可能性。

一、语言的缺席与身体的归顺

性与语言是人类自我表达的两个最根本的方式。在个人身份认同中,主体的自我首先表现为躯体的自

我,其次是作为言说的自我来参与整个建构过程,因而身份认同的过程也是个体以身体和语言的共构来进行一种“自传性叙事”的过程。影片中的阿黛尔多数时候不善言辞,面对知识—权力体系对个体的规训,总是处于沉默状态,不得不转向口欲与性爱来作出被迫的“回应”。这种身体与语言不和谐的共构让个体自传性叙事无法顺利进行。

1. 文化身份的不成熟——语言的缺席

艾玛作为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其语言系统在话语权力中占有压倒性优势。“当话语要求一个言说的主体为了要发言而必须参与那个压迫的框架——也就是理所当然地认定那个主体本身的某种不可能性或不可理解性——的时候,话语变得具有压迫性。”^[2]因而,出身劳工阶层只受过高中教育的阿黛尔因为这种

收稿日期:2014-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作者简介:李佳楠,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符号学、比较文学研究。

压迫的存在而成为一个“失语者”,二者言语上的不平衡象征了这对女同性恋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不对等。

阿黛尔对于艾玛画作的形容总是“这些画很漂亮”“你的作品很震撼,我无法形容那是什么”;在家宴客时,面对艾玛关于哲学、美术、影视媒体等方面的朋友们时,她只能这样介绍自己:“我在学校当老师。”当他们谈论希腊神话里的男女性高潮差异时,却只能作为倾听者而无法插话;当他们谈论画家席勒、古斯塔夫-克林姆等绘画风格时,借口自己“可能忘了”来掩盖无法回应的尴尬。这样的阿黛尔就像宴会里放映机里放映的默片《潘多拉的魔盒》里的女主角,经常被困在无言的牢笼之中,内心惊惶不定却无法出声。相反,在与她处于同一阶层,并完全接受了自己是男同性恋身份的男性密友 Valentin 面前,她反而可以很好地吐露心声:“是我的问题,是我缺少了什么。”

“沉默是表示被排斥在关系之外以及缺乏权力的透明能指。”^[3]影片正是通过阿黛尔的不善言辞放大了文化身份不成熟的主体在语言上的缺席,同时也放大了知识—权力体系对个体操控的影响。她的躲避是她语言的缺席以及文化身份尚不成熟的象征,这种无法表达言说的困难正是她有着自我身份认同困境的表现。

2. 被建构的性欲——身体的归顺

“性是在某个特定历史时空里由权力、话语、身体与情感构成的一个整体。”^[2]当语言成为个体身份认同中的障碍时,剩下的便只有身体。可以说,除了恰如其分的语言以外,不存在其他可能的救赎,唯一的救赎便是语言与身体共构的和谐。面对“他者”的嘈杂,阿黛尔被迫以身体或行动作出回应,转而对艾玛表示亲密邻近性关系的性爱。“邻近性,就其自身而言,携带着一种矛盾”,“它既可以是积极的(爱、亲密),也可以是消极的(侵犯、敌意)”,在她们二人彼此混杂的邻近关系中,可以从“上一下(或高一低)这种维度得到表征”^[3]。

电影的第一场性爱场景中,阿黛尔最先采用跪姿来取悦艾玛,带有臣服性的“跪姿降低了一个人的高度”^[3],这一空间符码是表示她“权力减弱的透明能指”。第二场性爱发生时,阿黛尔初次意识到了自己与艾玛

在经济、阶级、文化上差异。于是,她不仅在艾玛的引导下喜欢上了牡蛎^①这一带“性”暗示的符号,而且餐后的性爱变成了艾玛完全主导,艾玛驾驭性地从后面抓住阿黛尔的头发,阿黛尔则是被动的从属者。这些表意活动都是两人权力不平等的体现。而在第三场性爱中,两人使用了语言来交流性爱感受。艾玛以给阿黛尔补习哲学课来“比喻”两人之间的性爱,给阿黛尔的表现打分说:“你还需要学习。”阿黛尔则表示“我会继续努力的”。此时,阿黛尔的身体与性欲被艾玛代表的知识—权力体系抽象并固化成具体的言词和语句,就如同作为具有能动性主体的阿黛尔被艾玛以萃取式的方法画入画作中一样,沦为艾玛力量和欲望对象的能指。

正如巴特勒所说:“即使是在一个‘解放’的异性恋情欲或女同性恋架构里,权力关系仍持续建构着女性的性欲。”^[2]面对语言的缺席,阿黛尔的身体在“知识论述、权力运作以及社会道德链接在一起的关键链条”中,沦为被操纵、被宰制的地位,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游戏棋盘中的一个被耍弄的棋子”^[4]。但是,正是因为对身份认同的焦虑,阿黛尔对食物和性爱有着不断探索、实践的欲望,在应对这种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权力体系对个体的规训时,她虽然一方面沦为对艾玛代表的语言体系的归顺者,另一方面也具有了僭越这种知识—权力体系的可能。

二、语言上的反抗与身体的献祭

面对艾玛代表的知识—权力系统的规训,阿黛尔在后来同时出现了语言的拒绝和身体的献祭两种行为,这也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弱势文化与主流准则的相交之处的矛盾表现。

阿黛尔在语言上的两次说“不”发生在艾玛在家宴客的场景里。起初,艾玛为了掩饰阿黛尔在文化身份上的不成熟,担心因此给自己带来社交上的尴尬而故意对画廊老板夸大阿黛尔的写作能力。艾玛这种夸赞是处于主流文化地位的准则对于阿黛尔这个文化身份尚不成熟的主体的规训,而阿黛尔则用“迄今为止我只是写日记而已”进行了第一次拒绝。宴会结束后,艾玛

①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就普遍认为牡蛎是一种壮阳催情的食物,之后也用牡蛎来隐喻女性的生殖器官。

再次表示希望阿黛尔进行创作,并给以下三个理由(左栏),阿黛尔则相应地进行回绝(右栏),并且明确表达出艾玛“这样固执已见自己很受伤”。

艾玛	阿黛尔
(我认为)你可以虚构	(我)不懂怎么做 (虚构)
(我认为)你喜欢构造故事	(我)不擅长构造故事线
(我)希望你更充实	(我)有你就很充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对话伴随的是两人之间权力的不平等。艾玛发起对话,并且以省略施事主语的半命令形式,而阿黛尔进行回绝的语言是吸取并否定艾玛的命令内容来表达她的反抗。根据巴特勒的“述行理论”,我们认为阿黛尔的语言就是她的行为,她的这种拒绝的行为是通过她的语言完成的。也就是说,这种在语言上拒绝响应艾玛要求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完成反抗这一行为。因而,阿黛尔拒绝的行为通过她的言语行为一再被表述,“她拒绝的是将她自己与行为分离的语言的可能性”^[5]。如此一来,通过吸取和占有艾玛的语言,阿黛尔完成了反抗,也完全打破了两人之前在权力关系中的暂时性平衡。

但同时,就像影片课堂场景中提到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里的主人公一样,阿黛尔也“还是孩子”,她的文化身份尚不成熟,在文化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她拒绝自己但弱小,起码那天不行,在那天她会说不。她说不的那天,她死了。”而同样,从“沉默”的到说“不”的阿黛尔想要反抗语言权力系统的规训,就不得不进入到艾玛代表着的理性秩序的象征界中,并获得其在这种语言秩序中的位置。“符号进入象征秩序时受到的压抑构成了语言中的冲动性压力”^[6],在这种僭越性的努力中,原来的阿黛尔“死去了”。

这种主体语言身份“死去”一般的消解,让阿黛尔接下来用身体去向艾玛再次表示了屈服:“我想要你。”反抗后的她与反抗前归顺的她之间的偏差产生了类似“错误”的自我认知,她的身体也似乎作为客体或工具而受到幕后的已经偏移的自我身份的操纵。这种语言反抗后的身体屈服让身体变得具有某种“牺牲”品的意义。这种身体上的献祭姿态就是阿黛尔文化身份不成熟、语言缺席的象征。她对于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代表的

语言秩序拒绝后又服从的不彻底性,让影片所表达的文化权力系统与个体之间的矛盾被弱化、消解掉了。

三、性别身份认同的归顺与僭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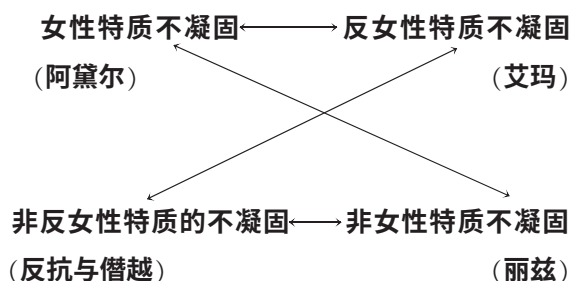
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指出,当人们说“这是一个女孩”的时候,对性别的建构过程已经开始了,“这一基本的询唤被不同的权威反复重复,并不时地强化或质疑这种自然化的结果”。“命名既是设立界限,也是对规范的反复灌输。”^[7]当影片在重复强调“我是一个女人是事实”的时候,也意味着被称为“女人”的阿黛尔的主体在这种反复灌输下被迫去“引用”性和性别规范,并在之后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加以模仿并进行“表演”,以便成为那个“召唤”她的统治阶层规定下的合格主体。但是,这种重复的模仿和表演是不连续、不稳定的。性别表演中常常出现断裂,这种断裂既让主体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中,也让主体性别身份的建构永远处于一种动态的形成过程中。阿黛尔这一主体也由于性别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使得以在实践中发觉更多的生存空间和个体价值,实现对社会性别规范的某种程度上的僭越。由于这种归顺与僭越的反复,主体在对性别身份的认同过程中才可能实现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和进步。

在电影中,阿黛尔起初在学校生活中是以异性恋的身份存在的。遇到女同性恋艾玛并对她一见钟情后,阿黛尔遭到了学校同学群体性的质疑并被原来的社交圈子孤立。我们可以看到,阿黛尔这样徘徊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模糊的双性恋取向是不被单一的性取向和异性恋霸权机制所允许的,但是她在这样的社会群体压力下仍然没有将自己的性向进行单一的身份归类。在影片中,她从始至终也没有对自己的父母、朋友、同事承认对于女性的爱恋倾向,最后她背叛艾玛进行出轨的对象又是一名男性。有着强烈流动性向的阿黛尔一直处于不稳定、不连续的性向实践里,而持续进行这种尝试爱恋不同性别对象的实践也是她在性别身份认同的困境中挣扎和探索的表现。在身份认同困境里挣扎的阿黛尔“因为害怕面对自己一直压抑和所否定的情欲,怯于质疑向来自以为最凝固的性身份”^[8],而成为了既被原有的朋友群体孤立也被艾玛所鄙弃的“‘离散’流浪于两个领域(异性恋/同性恋)之间的流浪者”^[9]。

如果我们对电影文本进行重新编码,阿黛尔的这一“流浪者”身份则可以得到更好的透明解码。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角度看,这三个人物生活于影片中的世界不是一种“事实”,而是事实的符号。应用“符号矩阵理论”,我们可以将《阿黛尔的生活》看作是一个关于女性性别特质是否凝固的对垒模式,将影片中先后出现的三个主要相关连的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女人(即阿黛尔、艾玛以及艾玛与阿黛尔分手后的伴侣丽兹)进行重新编码,从而得到影片故事的新的文本意义。

在这种编码体系中,人物的关系是通过在性别扮演中的角色来体现的。阿黛尔作为单一性别机制中的异类,她的穿着总是随着场合、身份的变化在男性化与女性化装扮之间交替,她既与男性也与女性交往,是女性特质不凝固的代表。艾玛具有男性性别特质,她留着男性化的短发,极具事业上的野心,这些都是西方文化中关于男性的习惯性能指,并且她对阿黛尔的双性恋倾向十分鄙弃,所以将她作为反女性特质不凝固的代言者。两人的对立是电影情节发展的主线。随后丽兹作为文本的第三者出现,她是一名孕妇,在生子之后与艾玛住在一起并照料生活起居,是非女性特质不凝固者。而此三者在不同维度内彼此区别,却又彼此联系;而维系他们的主题,即是非反女性特质的不凝固,也就是在结构主义下的《阿黛尔的生活》性别身份认同中的一个新的意义:对女性特质的凝固,也即单一(女性)性别区分机制的僭越。

如下图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反女性特质不凝固的艾玛与非女性特质凝固的阿黛尔之间的对立是影片故事的主线。在阿黛尔的身上,女性特质是不凝固的,她的性别倾向也是不稳定的。一方面,她会随着不同的场合变化来进行不同的“扮装”,来实现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的切换。在与艾玛一起宴客以及后来因出轨被赶出家门

又企图再挽回艾玛时,阿黛尔特意穿上了裙装,这一女性表示相对于男性的习惯性能指表明女性特质在她身上暂时性地凝固,是一种迎合、归顺的体现。而当她去学校做老师时会穿着裤子和男式的宽大西服,工作起来沉着稳重,这是她在社会性的工作中流露出男性特质的表现。这种服饰转换就是阿黛尔面对社会规范时的“性别表演”。巴特勒认为,这种不同的“扮装”行为,是对性别表现方式的一种否定。阿黛尔就是通过“扮装”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单一性别区分机制的颠覆与僭越。而另一方面,她面对艾玛以工作为借口的冷落而与男同事出轨,对男性故意做出“摆胯”“扭臀”“抛媚眼”等动作,这种表面上故意以女性特质吸引男性的行为,是为了应对作为艾玛冷暴力而做出的发泄和“报复”。而这种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游走行为让艾玛怒不可遏,大声骂着双性恋的阿黛尔是“贱人”“婊子”,并把她赶出了家门。这种贬义的称呼是反女性特质不凝固者对于女性特质不凝固者的愤怒指控和批评。阿黛尔被艾玛赶出家门则是她这个女性特质不凝固的跨界者被单一性别区分机制驱逐出境的象征。

阿黛尔女性特质的不凝固让她陷入个体性别身份认同的困惑和单一性别机制对个体的巨大压力中,她既有着向性别规范归顺迎合的倾向,也在性别疆域的边界之间徘徊游离,以至于与艾玛分手后的三年时间里无法走出阴影,找到更好的感情归属。阿黛尔过去的同性恋取向已被质疑,后来又不被同性恋群体接受,成为了为离散游走于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流浪者,个体的身份认同如流离失所的移民一般,无法在两个群体之间找到真正的归属。

但是,这种个体女性特质的流动性在某种程度上却动摇了社会规范里单一性别机制对主体性别的风格化、程式化的重复建构,让阿黛尔成为打乱异性恋机制和单一性别区分的破坏者和僭越者,“它的出现表示统治结构中出现了断裂和罅隙”^[3]。正是由于在这种归顺与僭越的反复,使她在性别身份的认同过程中具有了开放性和变化性,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谋求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个体价值。

综上,通过对阿黛尔在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中的归顺与抵抗的多重解读,我们得到了藏匿于电影故事之

下的新的意义;在知识—权力体系的运作下,个体的抵抗和拒绝依然存在着被纳入到体系内部的趋势,依然有着被归顺到权力体系的合力中的可能,这是主体身份认同中所要面对的更深层次的困境。但同时,主体在身份认同中保持自身特质的开放性、流动性也让我们看到了面对权力规训来争取个体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个体价值的可能。

这也与影片最后开放式结尾所要表达的含义不谋而合,阿黛尔即使依然处在身份认同的困境和矛盾中,也坚强地独自一人沿着某条街道走向未知的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远方,阿黛尔的生活也将翻开新的篇章,柯西胥的这部电影也因此有了更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如伽达默尔所言:“对一个文本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这不仅是指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致真正的意义从一切混杂的东西中被过滤出来,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现出来。”^[10]

参考文献:

[1]唐小林,祝东.符号学诸领域[M].成都:四川大学出

版社,2012.

[2]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3]霍奇·克雷斯.社会符号学[M].周劲松,张碧,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

[4]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5]都岚岚.论朱迪斯·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再阐释[J].英美文学研究丛刊,2012(2).

[6]程丽荣.奥兰多之路:性别符号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0).

[7]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8]周华山.同志论[M].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

[9]李莹萱,施俊明.探讨女同性恋之复合情欲与流动:以电影《高档货》为例[J].性学研究:第三卷,2012(1).

[10]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安然)